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进展

唐 兵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在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旅游开发成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引起了旅游学界、业界的极大关注。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的历程、内容、地域和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等3个阶段,但总体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旅游扶贫含义及其支撑理论、特定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分析及基本思路、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及模式研究、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和对策研究等;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研究区域集中在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四川、青海等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旅游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今后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关注贫困人口获取利益和发展机会的途径、构建旅游扶贫的本地化产业链尤其是与文化产业的整合、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方式等问题。

关键词:旅游扶贫;民族地区;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4)07-0026-07

Research Progress o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Tang B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due to a high degree overlapping of ethnic areas,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areas with rich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mean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ethnic areas, which is paid attention to by tourism experts. This paper reviews academic literature about the researches o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tourism (PRT) in ethnic area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earch of PRT began in the end of 1980s and it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 namely the beginning stag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stage and fast development stage, but still being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meaning of PRT and its supporting theories; 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RT in specific ethnic areas; the effects, the patterns, the prob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PRT in ethnic areas. Most researches are based mainly on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he research reg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Yunnan, Guangxi, Guizhou,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wher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overty populations and rich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further, researche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uch as the pathways of gaining benefit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po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ndustrial chains, especially, the integration into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tud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perty right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Key words: PRT; ethnic areas; research progress

一、引言

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较少,

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旅游开发成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引起了旅游学界、业界的极大关注,并逐渐成为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为指导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促进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及贫困人口受益机制研究”(2011YBJJ02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渝东南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贫困人口收益机制研究”(13SKL04)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4-01-08

[作者简介] 唐兵(1966~)男,汉族,四川广安人,硕士,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分别用“旅游扶贫”、“民族地区”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获得学术期刊文献121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以期较全面反映20多年来国内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研究的进展,为准确把握以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重点与实践提供指导。

二、主要研究内容

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战略模式研究

胡锡茹(2003)总结分析了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实践中形成的3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1]。金方梅(2003)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该模式强调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旅游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一种以真正文化旅游者为唯一目标市场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2]。谭丽燕等(2006)在分析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有利条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农户直接参与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品经营扶贫模式,建议采用旅游直接扶贫与间接扶贫相结合,就地扶贫与异地扶贫相结合的方式^[3]。闫沙庆等(2006)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个案,讨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等问题,提出了“家庭游”模式,分析认为“旅游富民”模式真正把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对象,取得了较好的效应^[4]。姬丹(2007)分析了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的模式和利益分配方式^[5]。黄继元(2008)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就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反贫困功能、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能帮助更多农民摆脱贫困的新模式;指出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必须明确“扶贫”这一主题,最终要让农民成为真正的最大受益者^[6]。王丛丛(2010)以西江千户苗寨为调研对象,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功能与效应,他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7]。朱华

(2011)经过研究认为在民族地区定居点的旅游扶贫开发应采取“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即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社区广泛参与,发挥主要利益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着眼长远利益,走民族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8]。

扶贫开发战略与政策作为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重要工具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王兆峰等(2002)建议国家设立湘鄂渝黔边区旅游扶贫开发或武陵山旅游扶贫开发区,组建旅游扶贫管理机构,通过研究制订边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政策与规划框架,制定倾斜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9]。罗永常(2006)认为由于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旅游开发不会主动关注弱势群体,政府主导开发的目的在于确保村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实施;指出政府政策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村民参与的赋权机制、咨询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和培训机制,并建立相应的监测与评价体系防止信息不对等获取导致村民参与边缘化和扶贫目标被置换现象^[10]。何景明(2010)通过田野调查,认为审慎地选择开发方式以保护“地方感”应成为旅游开发的战略选择。其间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是边远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但当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让位于社区主导^[11]。文冠超(2009)指出旅游扶贫目标是确保农村贫困人口的受益和发展,他提出RHB战略尤其是H战略即强调人的内涵、人的素质等人文精神的提升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作用^[12]。

2.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效应是指旅游扶贫的功能和意义、在民族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主要包括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环境、文化效应。何景明(2003)等认为四川民族地区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旅游开发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面,增加人们收入,加快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13]。张伟(2005)从实际效应、感知效应和效应的可持续性等3个方面对铜锣寨风景区扶贫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旅游扶贫开发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较多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通过参与旅游开发活动能够获得经济收入、提高发

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14]。粟娟(2009)对武陵源旅游扶贫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行了测评,发现该地区已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相对落后地区跃迁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现代文明社会。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区域内基础设施不断加强,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5]。马创(2010)通过云南丘北县仙人洞村旅游扶贫调查研究发现,通过大量的旅游扶贫投资发展旅游业后,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正效应,但也存在着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环境破坏较大、贫富分化严重^[16]等方面。向延平(2010)运用CVM法对湖南省凤凰古城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WTP平均值为37.5元/人,WAC平均值为125.03元/人,WAC与WTP的比值为3.334;每年旅游扶贫生态绩效总经济价值中WTP为13 125万元,WAC为43 760.5万元^[17]。王丛丛(2010)以西江千户苗寨为调研对象,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功能与效应。作者认为应调动广大贫困农户的积极性,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利用西江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及社区对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态度,把旅游看作是推动文明进步、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把社区参与旅游作为旅游扶贫的有效途径^[7]。肖星(2005)认为西部旅游开发实质上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西部旅游开发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抉择,提出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同步推进的基本思路,指出“以旅游保生态,以生态促发展”应是民族地区最佳的选择^[18]。陈志永(2010)以旅游增权为理论指导,以典型的民族村寨社区——贵州郎德苗为样本地,以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为测量指标,对旅游增权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贫困地区应以社区为核心力量进行旅游开发,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较强,对旅游去权的感知相对较弱。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增强其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可以使社区诉求和利益具有更广泛的表达渠道和完善的伸张机制;可以使村民从内心深处积极投入到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中来;可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整体感^[19]。杨建春等(2011)选择贵州省1994~2007年度数据并借助EViews5.0软件利用VAR模型对旅游扶贫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贵州旅

游业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贫困减缓虽然受到自身贫困深度的影响,但旅游业发展对其促进作用很明显^[20]。冯旭芳(2011)通过对锡崖沟景区贫困人口感知效应的调查分析,发现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旅游开发使家庭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对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但也有村民认为由于其自身文化、技能、资金等限制,只能获得少量的短期利益,并有逐渐减少的趋势^[21]。

3.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社区受益机制研究

吴忠军(2005)认为龙脊梯田景区的利益分配没能真正体现社区居民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景区开发时没有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资产评估。因此,在旅游开发和旅游利益分配中,应树立“当地居民利益第一”的思想,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实行股份制,在对景区旅游资源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当地居民主要以旅游资源的资产价值为依据进行股权投资,与外来投资者一起参与分红^[22]。王永莉(2007)分析了四川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制约贫困人口受益的主要因素,提出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基础教育投入和与旅游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重视非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的参与和作用、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等^[23]。冯万荣(2007)选取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旅游扶贫案例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分析表明当地居民能否受益及受益程度和当地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与他们参与旅游业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关^[24]。袁明达(2009)在分析了湘西州旅游开发中贫困人口的受益现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开发的贫困人口受益模式即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提升人力资源等机制^[25]。李佳等(2009)分析了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居民参与意向、参与能力、参与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有显著差异^[26]。王丽丽(2011)分析认为雨崩村居民基于内心深处的藏族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制定了一系列的旅游经济收益分配及协调制度。即在传统伦理道德“公平”价值观影响下,本着“平等参与、平均受益”的社区旅游业发展目标,当地居民经过多次家长会协商与不断修改,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旅游经济收益分配制度及协调机制^[27]。

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罗永常(2003)认为民族旅游开发导致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传统民族文化走向衰退和消亡,价值观的改变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民族传统文化的粗俗化,出现了“旅游扶贫,越扶越贫”的现象^[28]。杨学燕等(2004)研究发现,由于管理机制的问题,旅游开发的受益者往往是掌握行政特权的人及旅游开发商们,当地民众收益的比例极小和村民的贫困与村官、县官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29]。吴忠军(2005)认为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旅游飞地”现象,导致当地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存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22]。刘焜(2006)研究认为当地居民作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所有者,应参与要素分配,当该产权不能体现在资源产权构成中,居民在承担社区旅游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的同时,其外部经济性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和激励,导致民族文化因丧失传承动力而退化或消失^[30]。何喜刚(2006)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未经科学规划和论证盲目进行旅游开发,使当地民风民俗民居民情在旅游发展中逐渐“异化”或消亡,旅游吸引力减弱;二是在旅游规划和开发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缺乏正常和通畅的渠道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31]。刘绍吉(2008)通过对五龙壮族乡村旅游扶贫开发进行研究,发现存在政府主导作用不明确、对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保护不够、认识不到位、弱化了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问题^[32]。粟娟(2009)分析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贫困人口由于没有技能、知识和金钱,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作,收入增长缓慢;当地社会治安变差,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十分严重^[15]。廖胜(2010)发现当地贫困社区没有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体,无法从旅游活动中获取收益,相对于其对旅游者和旅游开发商出让的利益如活动空间、良好的生活环境等不成正比,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抵触情绪会日趋加深^[33]。张方(2011)指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存在急于求成、缺乏整体区域规划、缺乏旅游专门人才、旅游扶贫思路比较狭窄、开发内容缺乏科学调研分析、导致旅游产品缺乏创新、产品配套程度差等问题^[34]。

针对上面出现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

建议与对策。杨敏(2003)指出要突出民族性。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商品开发以及发展地区民族工业等诸多方面要以自身的民族特色为依托,表现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要使旅游与农、林、牧、副、渔以及乡镇企业协作,使其产生良性的互动效应,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35]。罗永常(2003)认为开发民族村寨旅游,须确立社会性的发展观,即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要尊重社情民意,促进当地居民全面参与,并通过参与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28]。杨学燕等(2004)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协调好旅游扶贫开发与农民受益的关系。同时在旅游产品开发时六盘山地区要以自己独特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借助丰富的自然、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展示六盘山的价值,形成六盘消夏避暑游、历史文物寻古游、民俗观光游、生态环境游以及和专项旅游相结合的特色旅游产品^[29]。刘焜(2006)指出贫困人口要真正通过旅游开发获利,需要在当地建立一个健全的保障机制,以杜绝旅游开发帮富不帮贫、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政府要创造全方位鼓励贫困人口参与社区发展和管理的环境,对旅游类型的选择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参与,建立公平的资源分享机制和产权界定原则,同时注重培养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30]。刘绍吉(2008)提出应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扶贫环境,注重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的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扩大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建立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32]。杨红英(1998)认为旅游扶贫开发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筹集旅游扶贫开发资金,建立多种形式的旅游开发经济实体;积极鼓励扶持贫困农民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为他们寻找更多的旅游脱贫方式;围绕旅游扶贫,大力发展旅游农业;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解决发展旅游业所需的人才问题^[36]。

三、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地域

1.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描述性研究

和解释性研究占据主流,即侧重于对旅游扶贫问题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分析,对建议与对策、战略和思路的构想与模式和机制进行设计,以及运用概念性方法分析旅游扶贫的理论支撑、对旅游扶贫的含义和功能等的阐释。数理统计主要是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简单统计与借助相关模型和软件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和当地居民对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进行统计分析及其结果检验等。张伟(2005)^[14]、粟娟(2009)^[15]、李佳(2009)^[26]、马创(2010)^[16]、王丛丛(2010)^[7]、冯旭芳(2011)^[21]等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数理统计;向延平(2010)^[17]、杨建春(2011)^[20]分别利用VAR模型和CVM法对旅游扶贫效应和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2. 主要研究地域

由于历史和地理区位的原因,在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即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然而旅游资源又十分丰富的中西部民族地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的扶贫标准,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部217个,占36.8%;西部375个,占63.2%;其中民族地区232个,占39.2%。因此,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群的集中分布地,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热点地区。从研究区域的省际分布看,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大部分民族地区,其中云南、广西、湖北、贵州、甘肃、四川、青海等7省是研究热点地区。从研究地域的等级来看,研究较多关注西部、省区、县域、地区等宏观层面,而乡村、景区等微观地域层面文献较少。

四、结论与展望

1. 主要结论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迅速发展等3个阶段。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效应;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占主流。

虽然民族地域旅游扶贫研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但旅游扶贫研究质量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研究对象方面,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一个显著不足之处是对身处贫困问题漩涡中心的贫困人群获利、发展机会及能力提升等方面关注不够。虽然相关研究已经认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但大多局限于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模式构建和机制设计。关于弱势群体参与、旅游业如何与其他产业结合尤其是与民族文化产业结合等缺乏系统研究。对贫困人群在旅游开发中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问题也极少涉及。对旅游扶贫基础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功能、模式、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与保障机制,贫困人群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行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与产权界定及其利益分配方式等缺乏研究。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而对微观地域有深度的实证研究较少。

2. 研究展望

从前面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研究分析中可以看出众多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成果,也对实际扶贫产生了较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从整个研究现状看,笔者认为以后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分析研究。

一是加强对贫困人口受益模式和利益保障机制的研究。虽然学界对旅游扶贫的核心是贫困人口获利、发展机会这一问题取得了共识,但从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情况来看,真正把研究目标瞄准贫困人口的文献并不多,大部分文献集中在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层面上。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际状况看,贫困人群不仅没有从中获得收益,反而还会承担环境污染、物价上涨等各种各样的成本,不但丧失了发展机遇,甚至出现了贫困程度日益加深的现象。地区经济增长不等于贫困人口的受益,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发展问题上的两难窘境。而要让旅游朝着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有某些机制保障。因此,以后应加强旅游开发方式、社区参与模式、利益分配方式、产业结合形式、员工培训方式、土地补偿方式、第三方参与等有利于贫困人群受益的保

障机制研究,防止扶贫目标被置换。

二是加强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资产评估与产权界定及其利益分配方式的研究。贫困人口受益少或出现“越扶越贫”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产权定位也不清。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较少,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当地居民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以生活的艰辛为代价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因此,当地居民既是本地旅游的重要客体,又是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所有者。而在旅游扶贫开发 and 运营中,由于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晰,贫困人群对旅游资源的所有权未能通过经济收益体现出来,他们所承担的旅游影响也未得到较好的补偿。由于没有对民族文

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资产评估及产权界定,使外地投资商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对当地居民祖祖辈辈以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民俗风情旅游进行开发的权力,并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作为旅游地活态文化载体的居民在分配上却没能真正体现其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与参与要素分配,不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或所得远远低于其资源的经济本身价值,却要承担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成本,严重损坏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扶贫目标被置换,导致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不可持续性。

3.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差异对比

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起始于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影响研究,即旅游对旅游地经济发展的意义、作用及其一些负面效应^[37]。其研究比国内早,研究内容也相对具体和广泛。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对比

研究内容	国内	国外
利益相关者	研究范围较窄,多数只涉及政府、当地居民、开发商等。	研究范围较广,不仅涉及政府、当地居民、开发商,还分析非政府组织、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等,研究视野较广。
研究目标	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着重于如何通过旅游开发和壮大旅游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关注贫困人口,关注如何使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和净利,研究目标准确具体。
资源所有权	国内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属研究空白。	研究了土地权利对开发商的投资风险和社区获利的影响,建议提高当地人对土地、野生动植物、文化遗产、风景区以及其他旅游设施的使用权和进入能力。
政策法律制度	政策研究内容多,但法律制度与权力几乎没有涉及。	政策框架和法律制度研究内容都较为丰富。
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是中国旅游扶贫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成果也很丰富。	主要关注贫困人群的受益机制而不是扶贫模式。
研究地域	研究地域范围较窄,集中于对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进行研究。	研究视野开阔,从国际、国家、地区、旅游接待地等多个层次逐层展开。

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的差异。总的来说,国外研究内容较丰富,范围较广,视野开阔,整体研究水平领先于国内。但国内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旅游扶贫模式研究就很有特点。由于中国社会历来是强政府、弱民间,相对于强大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发育程度较低,在旅游扶贫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微弱,因此,国内旅游扶贫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旅游扶贫开发应该走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由于上面的这个原因,国内对旅游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范围较窄,多数只涉及政府、当地居民和开发商等,很

少涉及非政府组织、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等旅游开发的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 [1] 胡锡茹. 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 经济问题探索, 2003, (5): 109~111.
- [2] 金方梅. 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探讨——重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3, 21(4): 13~16.
- [3] 谭丽燕, 李月兰.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扶贫模式探讨——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扶贫为例[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3(6): 132~234.
- [4] 闫沙庆, 李鸿, 崔亚虹. 新农村建设与民族地区扶

- 贫开发模式新探——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J]. 满族研究, 2006, (4): 42~46.
- [5] 姬丹. 乡村旅游·扶贫致富·政府行为——以安顺天龙屯堡为典型个案[D]. 贵阳: 贵州大学.
- [6] 黄继元. 民族生态文化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石林县大糯黑阿诗玛民族生态文化村规划为例[J]. 昆明大学学报, 2008, 19(2): 10~14.
- [7] 王丛丛, 王仕佐. 论旅游在民族地区的扶贫功能——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中国市场, 2010, 587(28): 101~102.
- [8] 朱华, 董婷. 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以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J]. 改革发展研究, 2011, 168(4): 68~70.
- [9] 王兆峰, 张海燕.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战略[J]. 老区建设, 2002, (4): 24~25.
- [10] 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J]. 贵州民族研究, 2006, 26(4): 32~37.
- [11] 何景明. 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省思——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中心的考察[J]. 旅游学刊, 2010, 25(2): 59~65.
- [12] 文冠超. 基于改良的RHB战略的贵州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研究——以荔波县为个例[J]. 改革与开放, 2009, (10): 80~81.
- [13] 何景明, 李辉霞, 何毓成, 李立华. 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旅游开发与贫困缓解[J]. 山地学报, 2003, 21(4): 442~448.
- [14] 张伟, 张建春, 魏鸿雁.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5, 20(5): 43~49.
- [15] 粟娟. 武陵源旅游扶贫效益测评及其优化[J]. 商业研究, 2009, 389(9): 205~208.
- [16] 马创.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投资的扶贫效应研究——以云南丘北县仙人洞村为例[J]. 云南电大学报, 2010, 12(2): 90~92.
- [17] 向延平. 基于CVM法的凤凰古城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评价[J]. 贵州农业科学, 2010, 38(10): 234~236.
- [18] 肖星, 侯佩旭. 论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25(1): 69~72.
- [19] 陈志永, 王化伟, 李乐京.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研究[J]. 商业研究, 2010, 401(9): 173~178.
- [20] 杨建春, 肖小虹. 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 411(7): 212~216.
- [21] 冯旭芳, 徐敏聪, 王红.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分析——以锡崖沟为例[J]. 生产力研究, 2011, (5): 91~93.
- [22] 吴忠军, 叶晔. 民族社区旅游利益分配与居民参与有效性探讨——以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景区平安寨为例[J].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17(3): 51~55.
- [23] 王永莉. 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 经济体制改革, 2007, (4): 92~96.
- [24] 冯万荣, 赵庆红. 旅游扶贫的受益人群及其受益模式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23(4): 82~84.
- [25] 袁明达. 基于PPT战略的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受益模式研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09, 9(11): 68~70.
- [26] 李佳, 钟林生, 成升魁.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8): 71~76.
- [27] 王丽丽, 张晶晶. 梅里雪山雨崩村旅游扶贫受益机制研究[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27(2): 84~87.
- [28] 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03, 3(2): 102~107.
- [29] 杨学燕, 金海龙. 六盘山旅游扶贫开发实验区的开发对策探讨[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4, 18(3): 121~124.
- [30] 刘隼.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外部性影响及其消除[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6, 95(6): 56~60.
- [31] 何喜刚, 高亚芳. 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扶贫开发研究[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2(14): 97~99.
- [32] 刘绍吉. 滇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研究——以云南省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为例[J]. 经济师, 2008, (11): 259~260.
- [33] 廖胜. 虎牙藏族乡旅游扶贫问题研究[J]. 商业时代, 2010, (32): 139~140.
- [34] 张方. 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思考[J]. 区域经济, 2011, (2): 170.
- [35] 杨敏, 宋保平, 李君轶.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研究——以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03, (4): 47~49.
- [36] 杨红英.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思考[J]. 经济问题探索, 1998, (4): 60~61.
- [37] 张伟, 张建春. 国外旅游与消除贫困问题研究评述[J]. 旅游学刊, 2005, 20(1): 90~96.